

# 儒生与国运

刘修明 著



# 儒生与国运

刘修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傅里甫 汪维玲

责任校对：朱晓阳

## 儒生与国运

刘修明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52 万 印数 1—2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213-01127-8/D·167 定 价：27.20 元

## 自序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又包含着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根”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之悠长曲折以及他们的东方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实使人追溯历史，对尘封史籍的翻检又会反馈现实，引发历史与现实的共谐。中国有句老话叫“斯文一脉”，相当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

这本书不是系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我只是将以儒生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某些侧面结合起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发展、作用及其分化、衍变的历史过程。我的意图是想通过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关系，找到时空运动和文人的“知”“行”活动在中华民族艰难历程中主客观的汇合点，从而证实鲁迅这一著名论断：“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宋代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支配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超越时空的生命哲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切有良心的曾饱经忧患和贫

寒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心中都永远保持着祖国这块神圣的净土；即使他们远在世界各地，也不会忘记养育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和滋润了他们灵魂的华夏文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成为统治者的依附体。作为一个思想意识阶层的特点和秉性，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和认识，又会形成不脱离时代条件的相对独立的思想意识，造成他们与统治阶层既统一又矛盾的特殊关系。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但这个阶层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分化。哲学上有“二律背反”的命题，指的是理性企图对本性有所认识时，就必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这种统治者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二律背反，存在着规律和认识的矛盾。为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依附属性，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能形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力量，不能成为实体型的群体。作为社会的神经，他们能敏锐地感受而未必能有效地反馈；作为社会的喉舌，他们未必能直抒胸臆；作为社会的镜子，他们未必能解决积淀的实际问题；作为社会变迁的预言者和促进者，他们未必有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实力。尤其在封建社会末世，作为社会变革的先知，他们要预言新时代的真理，直言旧时代的真实，必须要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重负。国运的态势，直接影响他们的思维创造、实际作为和个人际遇。相对独立的思想意识和难以改变的依附身份的矛盾，支配着他们在被动和能动中艰难地从事思想、文化、学术的创造，或有限度地从事政治活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二律背反的辩证运动中，展开伟大而瑰丽、曲折而多彩的历史画卷的。在历史天平的倾斜与升降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必须承担起国运的重负和时代的使命。这同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

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是逻辑与哲理的形象表述。本书没有采用逻辑演绎与观念归纳的写作方式，而是用宏观概述下典型分析的方式，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典型剖析，以期求得某些规律性的认识。在典型意义上，史学和文学可以相通。哲理性的评论，也只有通过具体的人和事的评析才具有说服力。典型是发展锁链上关键性的环节，而不是无内在联系的连接。在典型的选择上，我尽量兼顾到各方面、各阶层，使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合辙，以体现《儒生与国运》这一题旨。是否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还有待于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审视和指教。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处在向 21 世纪转换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人格化代表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使命，是伟大而艰巨的。作为民族的脊梁骨，不管前景光明的道路如何曲折，受祖国人民和几千年文化养育的知识分子，将世代承载时代的使命、民族的使命、文化的使命。谨以这本不成熟的书，献给一切关心和致力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

作 者  
1995 年 2 月 15 日  
于上海市长寿桥畔

# 目 录

<b>自 序</b> .....	(1)
<b>第一章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和儒的产生</b> .....	(1)
第一节 儒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	(1)
第二节 孔丘所处的时代，他的使命和命运 .....	(16)
第三节 孟、荀——儒的变革和发展 .....	(42)
<b>第二章 封建社会开创期和儒生的地位</b> .....	(67)
第一节 秦汉历史转折中的儒生及其作用 .....	(67)
第二节 汉帝国封建大厦上层建筑的构建 .....	(82)
第三节 博士制度和儒相参政 .....	(109)
第四节 “党锢之祸”和太学生 .....	(132)
第五节 桓谭与张衡：独立意识和依附身份 .....	(151)
<b>第三章 封建制振荡与转变期的儒生及其特征</b> .....	(177)
第一节 动荡的时代，放荡的思想——中古转折时期 文人思想及其作风的形成 .....	(177)
第二节 两位名士，两种命运 .....	(205)
第三节 仙道和君道的对立：儒道双修的俗神仙 .....	(227)
第四节 反佛的儒者——范缜 .....	(249)
第五节 动乱中的史学和范晔的悲剧 .....	(270)
<b>第四章 在封建社会巅峰期的历史潮流中浮沉</b> .....	(286)

<b>第一节</b>	<b>“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进士科与仕途</b>	
	经济	(286)
<b>第二节</b>	<b>开元盛世与儒相的建树：姚崇和宋璟</b>	(306)
<b>第三节</b>	<b>儒家道统：在依附和对抗中重建</b>	(333)
<b>第四节</b>	<b>儒家诗文化的高峰</b>	(358)
<b>第五节</b>	<b>党争与儒生——李商隐的苦闷</b>	(381)
<b>第六节</b>	<b>卷入农民起义的风暴：皮日休的思想和生涯</b>	(403)
<b>第五章</b>	<b>发展和僵化：宋元明时代儒生的两重性</b>	(417)
<b>第一节</b>	<b>“庆历新政”、“荆公新学”和王安石变法</b>	(417)
<b>第二节</b>	<b>理学与纲常：思维的高峰，思想的囚笼</b>	(444)
<b>第三节</b>	<b>民族的灾难和儒生的救亡</b>	(470)
<b>第四节</b>	<b>“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王阳明和王学</b>	(493)
<b>第五节</b>	<b>异化和异端：李贽的思想历程和价值取向</b>	(512)
<b>第六节</b>	<b>“风声，雨声，读书声……”——东林党人反阉党斗争</b>	(534)
<b>第七节</b>	<b>乡绅与宦儒：从徐阶、董其昌到徐光启的转轨</b>	(555)
<b>第六章</b>	<b>末世的衰微与民主的曙光</b>	(568)
<b>第一节</b>	<b>气节与媚骨，觉醒与呼喊：明末清初三大儒</b>	(568)
<b>第二节</b>	<b>高压和逃遁：文字狱和象牙之塔</b>	(592)
<b>第三节</b>	<b>末世社会底层儒生的写照：《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b>	(610)
<b>第四节</b>	<b>封建末世的怒吼：唐甄、戴震和龚自珍</b>	(629)
<b>后记</b>		(660)

# 第一章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和儒的产生

## 第一节 儒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史上第一次发生大动荡的时代。

建立于公元前 11 世纪（前 1027）的周王朝，经过五六百年相对平静的发展，由于社会内部矛盾机制的作用，这个庞大而松散的宗法奴隶制王朝，在漫长的历程中，由盛而衰，从强变弱了。宣王（前 827—前 782）的一度中兴，曾使周王朝出现过短暂兴盛的气象。但周王朝与周围各族的矛盾和周王朝统治地域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内外交叉的矛盾和不断的战争，大量消耗了王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王朝进一步衰退。继宣王以后继位的周幽王，昏庸暴虐，在宫廷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交替作用下，于前 771 年被活动于泾渭流域（今陕西省彬县、岐山县一带）的犬戎杀于骊山之下。受到严重破坏的王都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在浩劫之后，残破荒凉，无法再作为都城。第二年，幽王的继承人平王在晋、郑诸国的保护下，不得不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这是当年周公东征武庚、管叔、蔡叔后，为控制东方而营建的政治、军事重镇。当年，周公东征和营建东都，是周朝王业巩固的象征，而公元前 770 年的平王东迁，则标志着周王

朝实力和威望一落千丈。这以后，历史上称为东周。它是周王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东周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王朝，分为春秋（前770—前476）和战国（前475—前221）两个时期。

早在周幽王六年（前776），周王朝的一个官僚贵族，就从当时的日食、地震、山崩、河沸的自然灾异中，曲折而恐惧地看到社会动荡对周王朝统治的巨大震撼：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日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sup>①</sup> —— 日食月食示人以灾凶，不再遵循常轨运行。天下没有善行德政，好人也得不到任用。上次日食还是常事，这次日食却显示着不祥！（据古历学家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前776年9月6日。）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sup>②</sup> —— 闪烁的雷电，不安宁啊，可不是好事。几百条河川在沸腾啊，山顶突然崩碎。高崖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大岭！地震怒了，可怜啊，当今的人为何不引起警惕！

据《国语·周语》：“幽王二年（前780），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韦注：“三川，泾、渭、洛也。”上面这首诗描写的正是这次地震。它形象地描写了周王朝严重的社会危机。

人世间的分裂、割据、兼并，是政治动荡的外在表现，是政局变化的主要形式。它意味着原先政治局面的重新组合（破坏性的组合），它也象征着周王朝的传统统治被非传统统治所肢解与取代。自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王朝的变迁，以分裂、割据、兼并为标志，变化越来越大。春秋时期诸侯各国之间兼并日趋发展。西周时期有1800国，到春秋时期兼并为100多国，在政治上起作用

---

<sup>①②</sup> 《诗·小雅·十月之交》。

的有 10 余国。大诸侯国的发展，使它们不把周王朝放在眼里，有的大国吞并了 30 多个小国，有的吞并了 40 多个小国。作为宗法奴隶制度总头目的周天子，实际上已丧失了控制诸侯的权力，中原地区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已无法靠天子的权威维持。这是一种以周王朝的衰落为代价的进步。从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宗法统治，变成大诸侯国兼并小诸侯国的统治，是宗法奴隶制统治的断层，表明原统治结构开始瓦解。大诸侯国齐、晋、楚、秦等国，先后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增强了自己的国力，争做霸主。他们企图以自己为主体，维护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他们仍属奴隶主阶级，然而在转变过程中的奴隶主阶级。其统治形态是以大诸侯国的变化中的统治，取代原先的周天子的宗法奴隶制统治。争霸的实际后果是渐进式地破坏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动随着这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它本身就是大变动的标志），在外部特征上更多地显示在历史事件上。春秋末，晋国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分割了晋国，在各自所属地区内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封建经济改革。接着，六卿之间相互兼并，到前 453 年，实际形成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前 403 年，三国迫使周天子承认他们为诸侯。早在前 481 年，齐国卿大夫陈恒（即田常、田成子）就杀了国君齐简公，田成子“专齐之政”<sup>①</sup>。前 386 年，田太公正式得到周天子承认。楚、秦、燕三国也相继发生新的社会势力取得政权的政变，终于出现魏、赵、韩、齐、楚、秦、燕七大诸侯国称雄的局面。七雄的出现，对周王朝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则是一种必然和进步。

政治舞台上的变化，有如海水激荡引起的飘忽不定的泡沫，造成它是海洋深层的涌浪和海面的激流。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生产

---

① 《史记·齐世家》。

关系的变化，才是一切政治风云的根本原因。鲁宣公十五年（前 594），周平王东迁后的 176 年，鲁国“初税亩”<sup>①</sup>，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一律收税。前 590 年，又“作丘甲”<sup>②</sup>，按地区范围对私田占有者征收军赋。“初税亩”以后的 32 年，季孙、叔孙、孟孙“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sup>③</sup>。季孙氏取新制，征税；叔孙氏“使尽为臣”，恢复旧的奴隶制；孟孙氏走中间路线，两种方式各半。25 年以后，昭公五年（前 537），三家再次瓜分公室，实行新制的季孙氏掌握霸权，三家都实行征税制，鲁国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周平王东迁以后，经过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鲁国才完成这样的演变，说明历史演变的艰难。鲁国的演变在春秋各国中还是比较早的。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前 548）司马子木时才整理田制，开始“量入修赋”<sup>④</sup>。郑国在公元前 543 年子产执政时才“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sup>⑤</sup>。5 年后再“作丘赋”<sup>⑥</sup>。秦国在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才“开阡陌封疆”<sup>⑦</sup>，“决裂阡陌，教民耕战”<sup>⑧</sup>，统统破除了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废除了原来的井田制。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所变化的表现。它们一旦规章化、法典化，就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变化。在以世纪为计量单位的缓慢的政治经济变革中，社会的震荡会直接影响到原贵族阶层的利益。春秋战国时期从社会深层到社会表层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

---

① 《左传·宣公十五年》。

② 《左传·成公元年》。

③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⑤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⑥ 《左传·昭公四年》。

⑦ 《史记·商君列传》。

⑧ 《战国策·秦策三》。

的浮沉和分化。它在人们思想和感情上引起的震动，在几千年后  
的今天，我们还能从上面引述的《诗经》里当时人的咏叹中，如  
此强烈、深沉地感受到。

社会变动的涌浪，冲击了社会原来“正常”的统治秩序，促  
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浮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骤变，也  
是社会阶层变动的生动写照。上层贵族的下降，下层庶民的上升，  
是社会变动，也是奴隶制瓦解、地主制兴起过程中必然的现象。在  
一切贵族的衰落中，首先是代表奴隶制宗法统治的周天子的衰落，  
然后是各级奴隶主贵族的衰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 510）  
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  
《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  
也。”杜预注：“三后，虞、夏、商。”事实上，“三姓之后”应从  
更广泛的含义上去理解，即春秋以来一切原来列于贵族阶层而今  
沦于庶民地位的王公子孙均在此列。《左传·昭公三年》（前 539）  
叔向论晋国公室和贵族衰落的情况，很有代表性。他说：“虽吾公  
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  
民罢敝……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杜  
注：“八姓，晋旧臣之族也；皂隶，贱官也。”）“晋之公族尽矣，肸  
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  
唯羊舌氏在。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十几个大族在短时期内衰落下来，谁也扭转不了如此迅速颓败的趋势。  
史墨的对话，叔向的感慨，相距不过 30 年，贵族沦落变迁的速度  
如此之快，说明各国内部因社会变化造成的剧烈政争，促进了贵  
族制度的崩溃。

周王朝的衰败和贵族的沉沦是同步的。破败的贵族面对毁圮的  
镐京，表达了他们悲悼的心情：“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  
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

苍天，此何人哉！”<sup>①</sup>

从没落的处境中，贵族们看到原在下边现能自由跑逸的兔子，原在上位却落入罗网的野鸡，联想到自身的命运，感到不幸和酸辛。世道变迁，如此不平，倒不如无知无觉地睡着，反而可以忘却人世沧桑、变幻无常的痛苦。这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哀吟：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叱。

“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罝。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sup>②</sup>

原来堂哉皇哉的大屋，再也住不上了；今天只能忙于糊口。本来每天起码有四大盆佳肴上桌，如今吃都吃不饱。可怜啊，再也不能看到当初的盛况了：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sup>③</sup>

原来吃的鱼，不是鲂，便是鲤，现在都吃不上了。以前讨老婆，是齐姜、宋子那样高贵的女人，现在没有资格娶了。如今只能在简屋陋居中，栖息此身：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sup>④</sup>

他们的处境是困窘的，心境是悲凉的：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

---

① 《诗·王风·黍离》。

② 《诗·王风·兔爰》。

③ 《诗·秦风·权舆》。

④ 《诗·陈风·衡门》。

为之，谓之何哉！”<sup>①</sup> ——我忧伤地出了北门，永远是贫穷和困窘。谁能了解我的艰辛，算了吧，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是破产贵族发自内心的哀鸣。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贵族的破产是怎样的多而且激剧”<sup>②</sup>。

一面是贵族的没落，一面是新兴的富有者的上升，强烈的对比，引起贵族们无限的悲愤：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sup>③</sup>

那伙暴富者，有好酒好菜吃，又有好亲戚和他周旋。我呢，孤单单，形影相吊，好不伤心。由是，因浮沉分化而激化的嫉妒之心，油然而生：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sup>④</sup>

——她的丈夫，漂亮得如美玉，简直超过了贵族！他打扮得如此漂亮，可毕竟不是我们贵族中的人！

“彼其之子，不称其服。”<sup>⑤</sup>

——哼，他们穿得再漂亮，也掩盖不了他们原来那下贱的身份！

那些“工正”和“贾正”，原来只是给贵族们服役，管理奴隶的，现在他们都不服约束，擅自经营起工商业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sup>⑥</sup>

对人间的嫉妒和怨愤，必然发展为对不公的上帝的诅咒——

---

① 《诗·邶风·北门》。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80页。

③ 《诗·小雅·正月》。

④ 《诗·魏风·汾沮洳》。

⑤ 《诗·曹风·候人》。

⑥ 《诗·邶风·雄雉》。

上帝啊，你为什么颠倒了人间的统治？！没落贵族不可能找到社会动荡、自身沉沦的社会经济原因，于是，就向冥冥中主宰他们命运的上天发泄怨愤：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sup>①</sup> 仰视上苍，不给我恩惠，反而给我灾害，让我受难！

“昊天上帝，则不我遗。”<sup>②</sup> 上帝啊，不给我饭吃！

“昊天上帝，宁俾我遁。”<sup>③</sup> 上帝啊，逼得我走投无路！

“昊天疾威，天笃降丧；瘞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sup>④</sup> 老天你好狠心，降给我如此大难，又到处闹饥荒，奴隶们都逃亡了，田地也荒芜了。

“倬彼昊天，宁不我矜？”<sup>⑤</sup> 明照四方的上帝啊，为什么不可怜我？

叹息、怨恨发展到极端，便出言不逊地辱骂起上天来了：

“昊天不平！”<sup>⑥</sup> 上天不平啊！

“昊天不傭！”<sup>⑦</sup> 上天不好啊！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sup>⑧</sup> 苍茫的老天啊，你太不讲德行了！

“昊天不惠！”<sup>⑨</sup> 上天不仁啊！

在奴隶社会的等级制阶梯中，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统治秩序，是不容僭越、混淆的。这个制度以礼法的形式维护和保障了社会的统治秩序，它的神圣性、不变性是不容任何人怀疑的：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

---

① 《诗·大雅·瞻卬》。

②③ 《诗·大雅·云汉》。

④ 《诗·大雅·召旻》。

⑤ 《诗·大雅·桑柔》。

⑥⑦⑨ 《诗·小雅·节南山》。

⑧《诗·小雅·雨无正》。

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sup>①</sup>

社会变动的涌浪，上下翻腾，开始冲破了几百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秩序，难怪沉沦者要谩骂和诅咒，不加掩饰地发泄怨恨。

大自然的灾异，象征的是社会关系的大变动。“高岸为谷”是说奴隶主贵族的破败，“深谷为陵”是说新兴地主阶级的登台。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理所当然地反映为各国的社会改革和大国争霸，并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在他们的社会地位、心理和思想上引起震动和反响。

✓ 在贵族阶级的沦落中，值得注意的是“士”这个阶层。

在王、公、大夫、士的贵族等级制阶级中，士是最低的一个阶层，它处于贵族和庶人之间。孟子答北宫锜问周室班爵之制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sup>②</sup>《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士的这一可以上下流动的中介地位，造成士不是上浮即是下沉的特殊命运。但上浮，因时代趋势而可能性很小；那么，下沉的命运，对他们就是岌岌可危而又不甘心的必然命运。

士的本义，是为人办事。《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sup>③</sup>《白虎通义》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sup>④</sup>这纯粹是从文义上解释。在中国古代社会，士是一个社会阶层，最低的贵族阶

---

① 《左传·昭公七年》。自皂至台，均为奴隶。

② 《孟子·万章下》。

③ 《说文解字注》，四库备要本，一上，第8页。

④ 《白虎通义》卷1《爵》引《王制》。